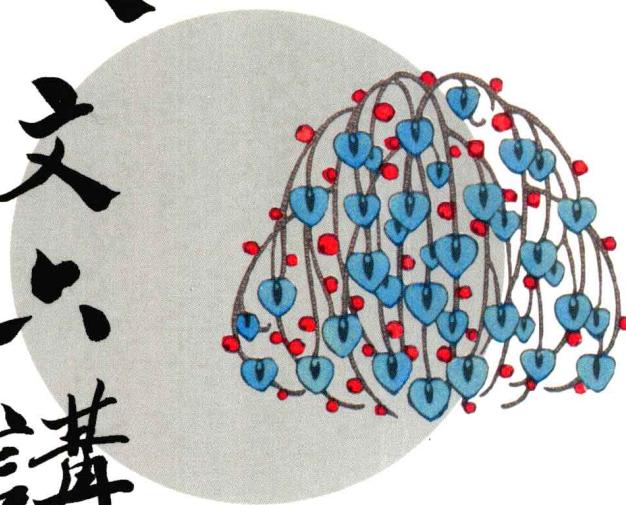


李歐梵 著

人文六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六讲 / 李欧梵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7

ISBN 978-7-300-15438-1

I. ①人… II. ①李… III. ①人文科学—研究 IV. ①C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8619号



人文六讲

李欧梵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mm×210mm 32开本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印 张 7.75 插页 2

印 次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70 000

定 价 38.00元

版权所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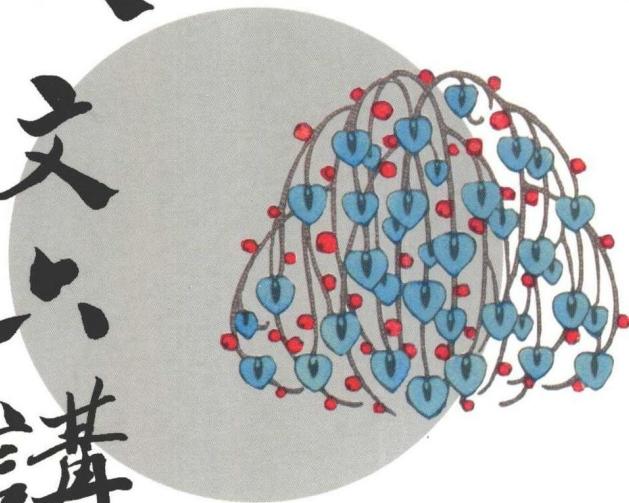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李歐梵 著

人
文
六
講



- 第一讲：
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
- 第二讲：
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 第三讲：
小说的当代命运
- 第四讲：
文学与电影：经典的改编艺术
- 第五讲：
音乐与文化：聆听二十世纪
- 第六讲：
田园大都会：人文建筑的愿景

学界中人，像李欧梵教授这样兴趣广泛且备受推崇的，绝对是凤毛麟角。李教授对电影、音乐、建筑等都有很好的见解，专业人士也得让他三分。

我见识过李教授苦读的身影，也明白其中甘苦。直到今天，听他满天星斗、才华横溢的演讲，或读他的散文随笔，你都能感觉到，这位名教授一直在认真思考——只不过因不再受学院体制的规约，可以天马行空，自由挥洒。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 陈平原教授

上架建议：人文 / 社科

ISBN 978-7-300-15438-



9 787300 154381

 天窗文化
ENRICH CULTURE

著作权全归浙江人民出版社所有 01-2012-1880

定价：38.00元

人文六講

李歐梵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目 录

- 006 • 简体版小序
- 008 • 《人文今朝》原序

- 013 • 第一讲 序论：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
- 036 • 延伸阅读 什么是文化？

- 041 • 第二讲 重构人文学科和素养
- 066 • 延伸阅读 全球视野中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

- 081 • 第三讲 小说的当代命运
- 112 • 延伸阅读 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读小说

- 121 • 第四讲 文学与电影：经典的改编艺术
- 144 • 延伸阅读 《文学改编电影》导论：改编的艺术
- 167 • 第五讲 音乐与文化：聆听二十世纪
- 190 • 延伸阅读 音乐与人生
- 207 • 第六讲 田园大都会：人文建筑的愿景
- 228 • 延伸阅读一 动感之都的漫游者
- 234 • 延伸阅读二 四个城市的故事

简体版小序

这本小书的原名是《人文今朝》，现应编者的要求改为这个题目，似乎添加了一点学者演讲的课堂味道。其实我本来的用意与学术无关，在原序中已经说得很清楚。然而后来发现，香港读者看这本小书的还是以学生居多，他们或者希望从中得到一定所谓“通识教育”的端倪，而社会大众恐怕依然不闻不问。看来我的身份还是学者。也许，用《人文六讲》这个书名，更名正言顺。

然而简体字版的篇幅增多了，也是应编者的要求。内地出版界似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本书至少应该有十万字以上才像个样子，而本书原文却只有八万多字，因此我又在每一讲后面加上一至两篇与讨论主题相关的文章（大多是演讲稿或会议发言的补写），也校正了少许编排上的错误，但内容没有更动。这六讲的对象本来是香港，特别是香港的人文危机，所以在行文中不时流露出我的香港生活经验和感受，或许不合内地读者的心态，在此先请包容鉴谅。我希望书中的大部分论题仍然有“普遍性”，所反映的是现今的全球人文危机。

在原序中我也提到：因为在香港大学的演讲用的是英语，所以阅读材料也以英语为主，幸亏当中不少书已经译成中文，有兴趣（或看不懂、买不到原文）的读者，可以参考，但我并没有看过这些译本，也不知译文是否忠实。

本书的第一讲，曾刊于北京的新刊物《投资者》杂志；最后二讲的大部分也曾蒙北京《读书》杂志刊登，在此特别鸣谢。另外我还要感谢天窗文化的各位编辑的协助，没有他们的催促，我的这本小书恐怕早已被市场遗忘了。

李欧梵

2012年3月29日

《人文今朝》原序

2009 年秋天，受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之邀，我在港大做了六场公开演讲，所用的语言是英文，对象除了在校学生外还有校外社会人士，只要愿意报名来听，一概欢迎。我本以为讲这一类有关人文（Humanities）的题目，对一般人可能枯燥无味，一定门可罗雀，却没想到全场爆满，报名的将近一百人。这一个现象，令我惊喜莫名，也不知所措，虽然尽心准备，而且尽量采用非学术性或较易懂的学术著作，但讲起来仍然困难重重，我必须用较浅显的英语把几个我最关心的课题——文学、电影、音乐、建筑——讲出来，并将之和今日香港的日常生活连在一起，真是谈何容易！在这个经济挂帅的金融中心，谈这些“非主流”的冷门学问，更有点吃力不讨好。

但我依然勉力而为之，因为我自认是一个“非传统”的人文主义者，这些都是我个人最关心、也最有兴趣的题目，即使我的演讲方式有点“高不成，低不就”，我还是感到一种使命感。况且这六个题目都是我自己定的，从学术的立场看的确有点好高骛远，但我在港多年来“浮游”于学

院门内门外，自愿当“两栖动物”，还不是为了推广我心目中的人文愿景。甚至有点“逆反心理”，越是处在这个商业环境，我越觉得有挑战性。所以为这六场演讲读了不少书，大多是在坊间书店买得到的（书单列于每讲之后），以英文的居多，因为我觉得在香港这个国际大都会有此需要，也和我近年来读西文书的兴趣有关。六场演讲下来，我并不满意，因为从课堂上走出来讲学术——这个尝试本身就有点不配套，我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包括英语表达能力），也可能低估了听众的水平，虽然大部分听众在孜孜细听，我也偶尔看到不耐烦的面部表情。好在每次演讲后，主办的单位安排两位讲评人，对我的讲题和内容深入讨论，也促使听众踊跃提问，令我获益良多。这六场演讲，主办方本来就有出书的想法，甚至场场安排录像，郑重其事。我在镁光灯照耀之下，顿觉自己在演戏，但却没有背好“台词”。我一向不写演讲稿，只准备大纲，有时便惊慌失措。这才发现，虽然自己有教学三十多年的经验，毕竟不是一个演说家，同是在课室里讲书（港大陆佑堂二楼的会议室

convocation room) 但不是上课，同是学生在听，但又有不少校外人士参加。在这个“混杂”（mixed）的听众面前，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演这几场戏。

虽然我表现欠佳，但自觉演讲的内容还是有根据的，不是信口雌黄，因为我从引用的各类书中找到不少“知音”，都是对人文有深度关怀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和理论家，令我觉得非但吾道不孤，而且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知名的知识分子早在我之前已经关心这些议题了。所以我必须公开承认：我的大部分观点都不是独创，而是“引他山之石”的“derivative discourse”（衍生论述）；换言之，此非一家之言，而是“众说纷纭”，只不过我做了一点总结心得罢了。内中很多问题还是没有想清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思考。

我决定用中文把这个演讲集写出来，为的是中文读者群（除了香港之外还有中国内地和台湾）毕竟比懂英文的人数为多，另一方面则是我的英文书写能力已经达到我的要求。我的中文但求通顺易懂，写起来较英文快得多，但我列的书目大半还是英文，好在内中不少已有中文译本，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照阅读。

在这篇小序中我不拟重述本书内容，反正全书篇幅不长，读者可以直接进入“文本”。想声明的是，事后的中文追记，虽根据当时的每一场演说大纲（在前五场印发），但细节有所出入。此书虽用演讲口气，但和演讲时的次序不尽相同，事后添加的内容也不少，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不是在场听众，听过的人可能至今也忘了。（将来是否把录像带公开尚未决定。）

在此我要特别感谢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总监，也是我的好友陈婉莹教授，和港大人文学院院长蔡宽量（Daniel Chua）教授，没有这两位热心人士在百忙之中为我的演讲系列“催生”，《人文今朝》恐怕也没有今朝。英文的题目是：Humanities Now，是我自己起的，心中想到的典故是影片 *Apocalypse Now*（港译《现代启示录》），语带危机感；副标题 *Perspectives across Cultures* 则是蔡院长加上去的，意谓视野是“跨文化”的，事后思之，我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

我也要感谢每一场的两位讲评人——大半是港大教授，他们在百忙之中亲临参加讨论，非但指正了我的不足之处，而且把一种良好的学术风气带给在场的非学术听众，令我感激不尽。

最后我要感谢几位最热心的听众，有的已经变成了我的朋友：徐曦、张雪红、吕书练、叶朗年（还是一个中学生）、刘庭善、赖雪芬、Saya Paranee 和李令乔。

我妻李子玉每场都来捧场，事后又善言安慰，为我打气，让我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书虫”。

本书之写作承蒙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之“公共文化计划”及港大“杜鹃（1972）基金”赞助，谨此致谢。

2010年7月17日于九龙塘

First Lecture
第一讲

序论：全球化下的人文危机

对我个人而言，这个讲题有点“反潮流”的意味：大家每天为赚钱而辛劳之余，谁还会想到“人文”的问题？如果人早已变成了一个“经济动物”(*Homo Economicus*)的话，何必再来探讨做“人”的意义？讲了也等于白讲。大约 20 年前，在上海刚刚改革开放之后不久，有些知识分子开始转业经商（当时叫做“下海”），于是引起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失落”的公开讨论，有关的讨论后来并结集成书，^①但在全国并没有展开辩论，结果不了了之。今天再讲这个题目，似乎老调重弹。然而，21 世纪初的今天毕竟和 20 世纪末的昨天大不相同：彼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飞，而今日的中国早已变成了 WTO 的一员，全球化经济的积极参与者，开放的市场经济模式早已形成。香港在“九七”回归以后，也被纳入这个模式之中，变成了其中的国际联网的中心，和上海形成经济发展的“双翼”。当年邓小平先生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想法——原来指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① 王晓明编：《人文精神寻思录》，上海：文汇出版社，1996。

两种制度——主要是侧重经济体系。目前在香港争论的反而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关于民主（特别是选举）发展的不同看法。在一般人民的经济生活方式方面，香港和内地各大城市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而海峡两岸的同胞，除了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之外，也早已被市场的潮流所席卷，这些原先是基本的政治性差异，似乎也被淡化了。换言之，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上逐渐进入一个同一的新时代，这个时代，早已有人命名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而这个名词到处可见，研究这个现象的专书也多到车载斗量，回想起来，不过是近十年的事。